

冷戰對於港臺的身分政治之影響

The Influences of the Cold War on the Identity Politics

陳欣欣¹

Angelina CHIN

陳奕麟這本以「忘記『中國性』(Forget Chineseness)」為題的著作，目的是要延伸及回應他在1996年一篇甚具爭議的文章，中文譯名為「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在這20年間，由於中國在經濟上變得強大，學術界探討「中國性」的文章、書籍增多，大多是分析「中國」作為一個文化概念的不同脈絡，以及其對於中國大陸以外地區，例如香港、臺灣及海外華人的文化與身分認同的影響。陳奕麟認為身分的產生，沒有一個起點，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要了解一個地區如何演繹和面對「中國性」，必須探討其政治背景、殖民經歷、國家之形成過程及國際關係。

此書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追索臺灣從1949年國民黨遷臺以後的中華文化至後國民黨的政治改變與身分認同。第二部分是用地政策，《號外》雜誌呈現的國際化(cosmopolitanism)及1997年前後的政治發展分析香港人的身分政治。第三部分集中研究經濟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探討中國大陸從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演變到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如何重新演繹「關係」、「大中華」及儒家思想等概念，而這些概念如何有利於政府與商家之合作。最後一部分回到流散(diaspora)的概念，解釋華人流散的特殊性，指出學術界的海外華人研究和亞洲研究內部的重重矛盾。每一部分大概有

1 投稿日期：2017年11月20日。接受刊登日期：2018年5月29日。

陳欣欣(Angelina Chin)，美國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歷史系副教授。

電子信箱：angelina.chin@pomona.edu

三章，而每一章重點評論一個現象或概念。筆者認為整體內容很精彩，但因為覆蓋的範圍廣泛，從臺灣教育到亞洲研究，一般讀者要由第一章開始看到最後，可能要花一點耐心和時間整理，才能充分把握作者的用心。

因為篇幅有限，以下集中討論開始兩部分的內容。本文嘗試用地緣政治與華人認同的雙重視角，來檢視本書對於香港及臺灣的個案分析，並以七〇後的香港人的角度，進行對香港認同及中國性的觀察。

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臺灣的國民黨政府以傳承中華文化的命脈自居。同時，國民黨受到冷戰的影響，一邊宣揚其政府是「自由中國」的代表，另一方面推行單一性的中華文化，憑著教育制度培育及加強臺灣居民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在後國民黨臺灣，隨著多重文化的傾向及本土論述的發展，產生了另類「國家」身分認同的「臺灣人」意識。陳指出，臺灣近年對於大陸華人的排斥，以及對於外國人的包容，是多元文化政策的後果。雖然表面上臺灣已經脫離了固有的文化系統，但國民黨數十年的統治影響深遠，臺灣社會是否真的已經從傳統承繼中華文化的中華民國成功轉型到多元文化的臺灣呢？這可能還需要一段時期觀察。這一部分，陳奕麟主要描述國民黨的政策及意識形態，充分表現出國民黨在文化與思想上的影響。的確，到了今天，仍然有不少臺灣人——不管是本省人或外省人——對於國民黨充滿感激的心情，認為國民黨帶動臺灣現代化。而今天失掉了政權，是因為李登輝把國民黨弄垮了。這一批忠於國民黨的臺灣人，很可能還會盼望兩岸統一的一天，即使是共產黨執政，總比臺獨勝一籌。另一方面，現今的主流民情，是要建立一個不受背景干預的臺灣。如果要重構臺灣歷史，現在一般的方法是要擺脫冷戰時期國民黨作為政治中心的脈絡，強調臺灣的根源是建基於16、17世紀時的移民潮，還有當時和歐洲的貿易關係，而20世紀前半的日本殖民歷史更是把臺灣與中國大陸隔離了。這個主流觀點，陳奕麟並不同意。他認為要重構臺灣的歷史，應該是從聯合國在1970年代初正式承認中國大陸為起點。原因是中華民國政府被趕出聯合國，這代表著臺灣不再是「中國」的象徵，也即是可以放下兩千年中華文化的包袱，變成「臺灣」的自主個體。

筆者同意陳的嶄新理論，也許用冷戰時期作為一個核心來研究臺灣的身分，以及臺灣跟鄰近地區（如香港、澳門）在那時期的關係，可解構以國家為中心的敘述，在研究華裔文化及華人流散歷史上會有一番新的景象。

這幾年的臺灣政治，或多或少與國民黨計劃跟大陸打通貿易關係有關。年輕一代對前途感到困惑、中小企業擔憂大陸市場對臺灣經濟的壟斷，如此引發了太陽花運動。這場運動改變了很多人對於臺灣的想像，質疑國民黨的領導能力，也孕育出新一代對於臺獨的期待。但蔡英文政府上台以後，不少靠旅遊業賺錢的中小商店又開始埋怨大陸旅客大幅減少，生意大不如前，又產生一種懷緬國民黨執政的情懷。也許他們對於「臺灣」的認同感又開始動搖了。陳奕麟並沒有分析太陽花運動對於臺灣社會的衝擊，即使是國民黨主政時期所經歷的二二八事件，至後來黨外運動的出現、原住民的抗爭，都不斷影響臺灣公民社會的定位。另外，太陽花運動以後，臺灣的學術界及學生組織這數年間與香港社運團體的交流變得緊密了，其中一些在臺灣聲援雨傘運動中香港學生的支持者舉起一張標語，很鮮明地道出臺灣人的擔憂。標語寫著：「今日香港，明日臺灣。」彷彿中共勢力變成了中港兩地的共同敵人，相信這類跨港臺的思潮對於「中國性」已經有另類的詮釋。

書的第二部分集中講香港。香港的一般形象是有彈性的國際化自由貿易港口。陳奕麟主要用不同主題討論英治時期的香港所呈現的殖民曖昧性以及香港人的國際主義 (cosmopolitanism)。香港人對於本土的身分認同是在1960、1970年代開始建立的。在此之前，香港人以中國人自居，香港文化只是廣東文化的延伸。雖然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但因為英國跟中國的關係，殖民政治並沒有積極培育香港居民對英國的愛國情緒。殖民時期的影響，主要是自由貿易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在1997年以前的香港，國族情緒是次要的。雖然陳並沒有直接討論香港近年流行的「核心價值」²論述，但

2 2004年六月，近300名來自不同專業、學術界人士在報章聯署《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列舉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和恪守專業」（張炳良、黎廣德、蔡海偉。

是所謂的核心價值，例如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和恪守專業等，都跟陳所描述的國際化的價值觀在內容上很接近。陳在第四章用過往在新界的研究為基礎，清楚分析英國在1997年前的特殊殖民政策對於香港人價值觀的影響。作者其實可以把分析延伸至1997年以後，進一步研究殖民時期的土地權跟近年新界菜園村等土地紛爭之關係，例如政府與房地產如何以收購原居民的土地，以及如何逼使農民遷徙、剝奪租農的耕作權利，引起社會對於本土農地及食物自主的關注。這些都是跟香港人身分政治有關的議題，亦跟全球化有密切關係，很多地方的近代公民運動都有相關的論述，所以如果作者能帶出土地權利與現今香港與世界各地的矛盾，而不限於以前的香港，相信會讓更多讀者產生共鳴。

一般描寫香港歷史的論述都會認為香港人這個身分是在1970年代，即經濟起飛的年代建立的，因為很多香港居民都在那年代積極建設香港社會，其貢獻獲得肯定，逐漸亦對這地方產生認同。陳奕麟的觀點跟一般關於香港人身分認同的研究不同的是，他強調的並不是在社會中、下層的奮鬥，而是香港在冷戰時期的位置。因為英國不想把香港變成國共兩黨的戰場，特意把香港變得非政治化，讓香港人有比較獨立的思想空間。筆者同意陳奕麟的觀點，認為要了解香港的身分認同，必須把切入點推前到1950年代，因為冷戰及國共兩黨的鬥爭直接影響到香港的地位。

第五章，陳奕麟以《號外》雜誌作例子，指出殖民時期主張的非政治性讓香港人似乎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生活」的層面上，看上去香港人在1970、1980年代好像少談政治。其實無形間新的本土身分已經鞏固於流行文化。而香港的文化就是儒家傳統跟英國殖民倫理的混合體。筆者認為，《號外》雜誌的確是1980年代的其中一個文化表徵(icon)，但只用《號外》來討論香港的身分認同，似乎把它在香港的地位誇大了。《號外》第一代

2004/06/07。〈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明報》，港聞A14。宣言直指香港核心價值備受中國共產黨政策衝擊，與港人所追求的目標愈來愈遠，呼籲市民齊以言論和行動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近年民主派遊行亦經常提到需要維繫香港核心價值。

的編輯陳冠中與鄧小宇也曾指出，他們出版這本雜誌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出一本供與他們的階級文化背景差不多的人閱讀的刊物。他們也很清楚《號外》本身是中產刊物，讀者多是當時留學外國回流到香港的五〇後青年。筆者是在香港長大的七〇後，雖然1980年代偶爾也會翻閱《號外》，但對這本雜誌沒有很深刻的感覺，看過的連載小說給人一種崇尚生活享受的感覺，是特定的知識分子的公共空間；它的內容所反映的，也許是1980年代一些可以跨越語言障礙的文青對於身處於一個國際化城市中心的反思與幻想(fantasy)，也可以是一個讓他們感到窩心的文化歸宿。但一般大眾怎樣呢？陳似乎忽略了他們的流行文化，尤其是大多數的中、下階層，他們的訊息主要來自電台廣播，而從1970年代開始主要的媒體應是電視。今天如果問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什麼是他們的集體回憶，他們一定會說無線的電視劇，其中《獅子山下》就是一個好例子，道出不少人的奮鬥心聲。在1960、1970年代長大的一般市民，他們喜歡的可能是諷刺時弊的處境喜劇，如《18樓C座》、《香港八X》等。引起他們共鳴的，不是品牌或對歐洲潮流的嚮往，而是每天的生活難題，大多圍繞著港英政府的政策以及新移民的湧入所產生的社會矛盾。一般市民觀賞這些本地製作後對所描述的處境產生共鳴，從而吸收其中部分，並慢慢把它們演繹為身分認同的象徵。

要進一步研究香港的身分認同與「中國性」，筆者認為還必須要回到一些政治上的事件對於香港人的衝擊，包括1967年六七暴動、1989年六四民運血腥鎮壓、1980至1990年代的民主運動、近十年的保育運動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等。其中六四事件在書中幾乎沒有被討論，陳亦只是在第六章輕描淡寫地指出當時香港人的反共情緒。筆者相信，1970年代或以前的香港人（以至海外華人）大多都會認為六四事件是他們的集體回憶或生命的轉捩點。那一刻是部分香港人對於中國認同的最高點。當時很多人害怕回歸，同時又會覺得香港有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使命。一般香港人都會被學生流血的畫面感動，希望可以為「中國人」做點事。筆者1990年代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當時校內就有一個中港研討社，很多香港留學生都積極參與並關心大陸的民主發展，所以當時的香港大學生有不少是熱血的愛國青年。1989年後至2000年初，不少的香港人期盼祖國會進一步開放。亦

airiti

有另一些香港人，因為六四事件開始擔憂1997年回歸後香港的處境。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香港年輕一代，就是所謂的八〇後、九〇後的身分認同。筆者認為香港近年的本土論述，大部分應歸功於2000年中期開始活躍於社會運動的青少年。當時香港政府為了發展，不惜拆遷有百多年歷史的皇后與天星碼頭，引起社會強烈反對聲音，人們認為這相當於是摧毀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現任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就是2007年皇后與天星碼頭保育運動的領袖。本土保育組織策劃一連串論壇與行動，阻止皇后碼頭拆卸。這場運動提高了香港人對本土和公共空間的意識，也讓香港人反省以往只顧經濟發展而忽略了環境、本土文化、和集體記憶的政策。到後來由學生帶動的反國教運動，以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更是研究香港人身分認同不可或缺的事件。它們反映了香港人的世代矛盾，部分人更因為對於傳統民主運動失望而轉向「港獨」、「香港立國」的政治理念。近十年的社會運動，可能是年輕一代對於1997年香港「被」「回歸祖國」及近年中共積極培養香港人的愛國情緒的反抗。亦有不少年長一輩的香港人因為新一代的衝擊從「大中華」的美夢甦醒過來，反思中港關係與香港前途問題，不再覺得香港人有任何能力影響大陸。今天的香港人大多認為香港如果能保住香港的高度自治就夠了，不用管深圳河另外一邊的事情。所以要研究香港人的「中國性」，必須要考量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新一代對於國族的意識形態，及他們對社會整體的影響。其實香港人對於「國家」的反思，可能是一個重新開啓「離散」(diaspora) 論述的切入點。重點不是「中國性」的文化意義或身分認同，反而是各地區或流散人士怎樣面對中國政權全球化擴張的問題。

其他的兩部分，因為篇幅有限不能詳細評論。整體來說，筆者感到遺憾的，是作者似乎未能對於公民社會做更深入的解讀，沒有解釋公民運動如太陽花運動的產生及其影響。其分析主要集中在統治政權的一方，亦並未解構每個國家政權的內部矛盾與複雜性，如對新加坡不同政黨的討論、臺灣民進黨的演變、香港泛民與本土派之矛盾等。但這本著作對於「大中華」、「中國性」的反思，相信將會推動新的學術浪潮，啟發更多有關的討論與研究！